

南溟、離散、地方感：楊雲史與使節漢詩

高嘉謙*

摘要

19世紀末期，中國使節的南來是觀察漢詩的境外離散和文化播遷的重要現象。本文關注使節代表的官方正統，面對西方勢力、華人移民社會，他們的漢詩世界所建立的異地景觀與文化想像，如何在早期南洋殖民地和華僑社群形成一個具有描述個體生存經驗、離散華人意識與外交視野的文學生產空間。

本文主要以1907年南來新加坡領事館任職書記兼翻譯官的楊雲史(1875-1941)為個案，這位出身蘇州常熟，晚清唐詩派名家的外交官，著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1926)，派駐南洋四年餘寫作的詩詞百餘首。其中取南溟為主題，以紀史姿態表現南洋華人移民和拓荒事蹟，尤其深入觀察和議論中國與西方殖民勢力在南洋地域的消長，開啟南洋漢詩的外交視域和地緣政治的書寫。另外，大量閒適詩生動記載南洋地景與流寓心情，經營唐詩格調和意境，形成迥異的南洋漢詩自然景觀。

楊雲史兼集憂患和閒適的漢詩寫作，在新馬早期漢詩史獨具特色。本文試圖從一組問題進行觀察。我們如何界定清帝國末代官吏的眼光？他如何從華人遷徙歷史、中國朝貢外交和西方殖民勢力三個範疇，重估詩對疆域的思索回應，融合為自己建構的南溟視域？這是詩人離散在外的憂患和建立詩史的依據？在閒適的山居生活裡，楊雲史為何跳脫出現實的風土，以唐音營構和回應殖民地自然景觀？以上提問，凸顯了楊雲史的境外漢詩探究故鄉／異地，中國／南洋，大清子民／離散華人文交織辯證形成的世界觀與地方感，開啟漢詩與自然、疆域的思辨。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南洋、楊雲史、離散詩學、漢詩、使節

The South, Diaspora and Sense of Place: Yang Yunshi and Han Poetry b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s

Ko Chia Ci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dispatched consuls to the south and meanwhile a great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immigrated to the same area. Both groups represented the dispersal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ir arrival in the south, coupled with their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poetry writing, gave shape to the early *Mahua* literatur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one Chinese consul in Singapore, Yang Yunshi (1875-1941) and his poetry writ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nsuls, representatives at the forefront of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and local early Chinese emigrants, were able to form a literary space in which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loc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an be portray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1) In what way can we 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vision of Yang as a Chinese imperial consul and how did he display his vision through poetry writing?

(2) In the terms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Chinese diplomatic tribute system and Western colonial power, how did Yang revisit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and formulate a southern vision of his own? How did such southern vision contribute to the display of diaspora an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Han poetry in the southern land?

(3) Why did Yang transcend his life in reclusion and respond to the local exotic

landscape in Tang poetic language and style?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above may very well reveal how the sense of globalization and place were constituted by sets of dyadic notions – homeland vs. exotic land, China vs. Nanyang, and citizens of the Qing empire vs. overseas Chinese – and shed new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an poetry, nature and geographic boundaries.

Keywords: *Nanyang*, Yang Yunshi, Poetics of Diaspora, Han poetry, Consuls

南溟、離散、地方感：楊雲史與使節漢詩*

高嘉謙

前 言

從 19 世紀末以降，中國使節和文人的南來形塑了早期新馬地區的文學生產，其中以漢詩寫作規模最為可觀。這些知識份子的南來凸顯出土大夫階層的境外離散和文化播遷，尤其部分南來文人兼具詩人和政治身分，他們流寓南洋期間的文化影響和文學實踐，都直接或間接形塑了我們理解殖民地時期新馬最初的文學風貌。本文關注官方派駐使節，其代表的官方正統身分，面對西方勢力、華人移民社會，他們的漢詩世界所建立的異地景觀與文化想像，如何在南洋殖民地和華僑社群形成一個具有描述個體生存經驗和帝國外交視域的漢詩地方意識。從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的角度而言，外交官詩人的漢學素養和境外寫作，提供了我們思考漢詩與華人移民社會的有效面向。他們在詩裡組裝了主體飄零和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的雙重體驗，對清帝國與外部勢力在的權力與外交佈局的國族想像，可視為世紀交替時期離散華人社群的重要歷史脈絡和生存情境。這些漢詩的美感特質和精神內涵，提醒了我們注意漢詩如何投映了早期馬華移民文學的生產型態，反思文學場域的組成條件。

本文主要以 1907 年南來新加坡領事館任職書記兼翻譯官的楊雲史（1875-1941）為個案，探究這位出身蘇州常熟的詩人，出入憂患與閒適的地域書寫，帝國與南洋的疊合辯證，如何形塑了 20 世紀初期獨具特色的南洋漢詩風景。本文試圖解析南來、離散和地方感作為理解楊雲史的使節漢詩的重要框架，再從楊雲史兼集憂患和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明清文學研究新動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2010 年 12 月 8 日）。感謝會議上黃錦珠教授、嚴志雄教授和諸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

閒適的漢詩寫作，探究他迥異於其他派駐南洋使節的眼界，藉由詩交織辯證近代外交形勢下的世界觀與地方感，同時在唐音營構和回應殖民地自然景觀的風格裡，掌握南洋漢詩的地域特色與文學意義。

一、使節漢詩和離散華人社會

(一) 使節與南來

1941年，在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編輯的郁達夫，接獲楊雲史的死訊，寫詩悼念抗日戰爭中避居香港，最後病逝異鄉的詩人故友。楊雲史享年67歲，郁達夫當時46歲，兩個不同世代的詩人，在亂離際遇裡恰似千里外的知音。郁達夫詩句「江東渭北縈懷久，王後盧前位置難」¹除了表達對楊雲史的無限懷念，同時借用王楊盧駱初唐四傑的排序典故，暗示個人與楊雲史的詩才難分高下。兩人都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火中，跨離國境南來。郁達夫在新馬一帶寫稿謀生兼抗日，楊雲史攜妾避亂香港，病痛纏身，生活窮困。然而，文人賦詩報國之情不減。郁達夫輓詩最後一聯：「最憐家祭傳遺訓，猶盼王師滅賀蘭」²，以飄零者的心態，期許他日抗戰成功，可以祭告亡靈。只是命運捉弄，郁達夫隔年也流亡蘇門答臘，最後被日本憲兵殺害，屍骨不存。

郁達夫在新加坡悼念楊雲史，無意中卻讓人想起了楊雲史跟此地的關連。郁達夫在中國兵荒馬亂的抗戰時期南來報社謀職，楊雲史則在清帝國搖搖欲墜的最後四年來到清廷設置新加坡的領事館擔任書記官，最後見證了帝國的崩毀。從19世紀末以來，南洋基本上是中國沿海勞動階層跨海謀生的重要地域，其中又以新加坡為重要落腳處。隨著清廷設立領事館，派駐使節，跨境南來的知識份子開始絡繹於途，

¹ 郁達夫：〈聞楊雲史先生之訃〉，王孫、熊融編：《郁達夫抗戰詩詞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頁25。

² 郁達夫：〈聞楊雲史先生之訃〉，王孫、熊融編：《郁達夫抗戰詩詞抄》，頁25。

一個離散華人的移民社會逐漸成形，經濟和文教建設也略具規模。文人南來無論為衣食奔走或文化宣教都難免有詩，於是一個漢文學的社群由此誕生。這些肩負傳統教養的士大夫寫作了大量漢詩文，刊載於當地報刊或收入個人集子，成了晚清以降新馬地區重要的文學資料。我們談論馬華文學史總無法略過南來文人的寫作。其中1938年南來的郁達夫雖以新文學小說家揚名，但他在南洋的動盪歲月留下的文學創作卻以漢詩為主，在某個意義上回應了在新馬延續至今的漢詩傳統。³

在新馬漢詩譜系，使節漢詩⁴向來頗具份量。其中以左秉隆（1850-1924）、黃遵憲（1848-1905）⁵和楊雲史（1875-1941）的名聲最大。三位使節中左、黃二人為總領事，黃遵憲更是揚名晚清的重要詩人。三人寫於新馬期間的漢詩多寡不一，但都有詩集留世。相對其他無名文人散落於報刊或亡佚的詩作，使節漢詩可以流傳，同時使節對華人移民社會有崇高的象徵意義，他們寫於南洋的漢詩在面對殖民地景觀和離散華人社會都有不同的眼界和意義值得觀察。於是在帝國使命、異地體驗和文化宣教等脈絡下，使節任務和漢詩的發展有了巧妙結合。

³ 本文不沿用常見的舊體詩或古典詩命名，而採用較為中性的漢詩（漢語詩歌），主要考量清末民初以來境外寫作的詩歌，不全然是五四文學革命以降開啟的新／舊、現代／古典二元對立的議題。漢詩一詞，一般指涉中國語境外的漢字文化圈的古典詩寫作。但本文強調漢詩，同時兼顧了境外寫作的傳統，且境外漢詩帶有「新意境、新語言、舊風格」的寫作趨向，多有音譯新詞新語入詩現象，漢詩（漢語詩歌）更接近現代情境下的境外寫作狀態——不在中國，既有漢語的文化想像，亦有漢語的表述邊界和語言混雜現象的實驗及思考。這也跟近年興起的 Sinophone 議題接近，境外漢語寫作背後的移居、離散歷史背景，不間斷的亂離經驗和在地生活的改變，以及由此面對西方世界、殖民地的異地語言和文化衝擊，形成另有脈絡的漢語語系寫作型態。

⁴ 從古代使臣奉命出國，到近代國際外交的國與國之間互派常駐使節，這些派駐國外的外交官都是具備傳統教養的士大夫，基本能寫詩，部分有詩傳世。這些在境外寫作的漢詩，既屬於使節個人的域外見聞和體驗的紀錄，自然也對出使歷程與派駐地域的文學生產發生意義。使節漢詩的特色，投映了身兼官方身分和任務的詩人，藉漢詩展現、辯證的域外眼光和見識，漸進改造和移轉了漢詩格式和體驗，甚至可以對應到不同的地域文學脈絡。諸如黃遵憲派駐日本期間寫作的〈日本雜事詩〉以序注刻畫明治維新的制度與器物，派駐新加坡寫作的〈番客篇〉對南洋華僑社會的描述。甚至出使中國的越南使節寫作黃鶴樓的詩文，都表徵了詩的外部目光。參陳益源、凌欣欣：〈清同治年間越南使節的黃鶴樓詩文〉，《長江學術》4（2011.4），頁144-157。

⁵ 左秉隆駐新期間共有兩次，分別為1881-1891，1907-1910。第二次剛好跟楊雲史抵新的期間重疊。黃遵憲駐新期間為1891-1894。他們寫於南洋的漢詩，分別收在左秉隆《勤勉堂詩鈔》（1959）、黃遵憲《人境廬詩草》（1911）。關於左、黃二位使節的漢詩特色，詳拙作：〈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32（2010.6），頁359-398。

然而，相較於左、黃二位總領事，楊雲史在新加坡的領事館僅擔任書記官。雖然楊雲史在江東一帶早有詩名，但作為領事館小吏，他的外交官地位顯然無足輕重，在華人移民社會的影響力不能跟左、黃相比。不過作為詩人，楊雲史寫於南洋期間的詩詞卻另有不同於左黃二人的風格意境。他留下的近二百首詩詞，以紀史姿態表現南洋華人移民事蹟，尤其對中國與西方殖民勢力在南洋地域的消長，有著深入觀察和慨嘆。另外也有唐人意趣的閒適詩表現個人處身異域的地方感。在左秉隆、黃遵憲、康有為、丘逢甲、丘菼園等重要嶺南詩人主導的南洋漢詩譜系裡，楊雲史以宗唐詩風凸顯了他的特殊位置和眼界。

楊雲史，本籍江蘇常熟，出身名門，李鴻章的孫婿。楊氏名圻，原名朝慶，另更名鑑瑩，字雲史，一字野王，齋號江山萬里樓。1902年應順天鄉試取第二名，任郵傳部郎中。少年時文名享譽江南，與江南文人才子汪榮寶、何震彝、翁之潤號稱「江南四公子」。他是晚清唐詩派名家，曾入同文館研習法文和英文。他為遠離晚清官場的鬥爭，自願南來新加坡領事館任職，停留時間長達四年。民國後居家盡孝，先後入吳佩孚、張學良幕府。他的一生感情波折，26歲髮妻病故、51歲續弦徐霞客亡故。爾後結交煙粉女子陳美美、狄美南⁶，抗戰爆發即避居香港，1941年病逝香港。

綜觀楊雲史一生，曾有兩階段的跨境遷徙經驗。第一次在1907年，那年34歲的他有感於「朝貴貪墨，民氣漸張……天下將有事」⁷，透過擔任駐英使臣的岳父李經方（第一任妻子）推薦，被分派到清廷駐新加坡領事館，擔任二等書記官，負責翻譯等工作。⁸儘管投身南洋異地，楊雲史的駐外生涯卻異常愜意。當時第二任妻子

⁶ 楊雲史著有《雲史悼亡四種》（民國刊本，出版年不詳）悼念徐霞客。他與陳美美、狄美南事蹟，參見陳巨來：〈記楊雲史〉，《安持人物瑣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頁168-171。

⁷ 楊雲史：〈楊圻謚妻記〉，《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文獻，2004），頁218-219。

⁸ 根據陳瀛一〈楊雲史先生家傳〉、李猷〈楊圻傳〉、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等文均記載楊雲史赴南洋的因緣乃「請於外部，乃奏充英屬南洋領事」或「總領事」。後續研究成果大抵據此引述其為新加坡領事。唯一例外的是程中山比對資料即清楚釐清楊雲史僅屬領事官官吏。事實上，楊雲史在〈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二卷三自跋〉已陳述：「於外交部求為譯吏於南溟之星洲」。根據外務部原始檔案記載，楊雲史赴新加坡領事館乃任職二等書記官，其在新加坡領事館任職期間前後經歷過左秉隆和蘇銳釗兩位總領事。相關檔案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頁406。程中山的說明，參見楊圻（雲史）著，程中山輯校：〈前言〉，《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3。

徐霞客和兩位小孩陪伴在側，居於新加坡小島的東邊山林，頗有世外野居之感。他在新加坡的生活時間約四年餘，最後在辛亥革命之後，感於國內局勢大變，遂辭職返國。

另一次亂世流離，則是抗戰期間的 1938 年，其時楊雲史已經 64 歲。一家人為躲避戰火，避居香港。他在港期間仍發表詩歌鼓吹抗戰，經濟狀況日漸困窘，靠故舊接濟。後舊疾加劇，誤服中藥，在港病逝。

楊雲史生前刊行的重要著作有《江山萬里樓詩鈔》（1926），後期避居香港時編輯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1941）因病卒未及出版，接續戰爭流離，親族所攜遺稿部分散佚於文革期間。目前可見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⁹（2003）和《江山萬里樓詩詞鈔（正集、續集）》（2004）除了是舊集刊印，還收錄不少未刊稿。¹⁰然而楊雲史散見民國報刊、別集和圖卷的詩詞仍有不少不曾收錄，香港學者程中山最新輯校《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2012）收錄 1926 年以來的詩詞，除了補足當年遺稿未能刊印之憾，更能準確還原楊雲史的晚年創作和事蹟。¹¹

兩次跨境移徙，可以看做詩人在不同的歷史際遇，以詩建構個體在時代中的視域。但歷來對楊雲史境外活動的研究成果不多，傳記和年譜記載也僅寥寥數筆帶過。¹²學者李慶年、嚴壽澂和黃錦樹基本描述了楊雲史寫於南洋的詩篇兼具憂患和閒適兩種類型，但沒有更細部申論。香港學者程中山就楊雲史在香港期間的詩文創作和活動進行繫年和佚詩輯錄工作。¹³楊雲史的境外寫作豐富，留下不少表現個人對時勢觀

⁹ 楊圻著，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¹⁰ 然而，這兩套文集的編輯出版，也非完整。其中的疏漏、錯誤和補正，參見香港學者程中山的討論。程中山：〈楊雲史香港時期（1938-1941）詩文紀事及其集外佚詩輯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6（2006.10），頁 393-432。程中山：〈楊元璋編《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詩鈔）部分勘誤〉，《文學論衡》12（2008.3），頁 46-59。本文所引楊雲史詩文均援引自上海古籍版本。後文不再詳列出處，只標示詩題和頁碼。

¹¹ 楊圻（雲史）著，程中山輯校：《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有關楊雲史詩詞鈔各版本編纂的體例和優劣比較，可參見程中山輯校版的前言。

¹² 陳瀨一〈楊雲史先生家傳〉、李猷〈楊圻傳〉和陳國安〈楊圻年表〉均沒有詳述這兩次旅居國外的生活和事蹟。此三篇文章均收入於近人編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¹³ 李文有專門一節討論楊雲史詩篇，但篇幅甚短。黃、嚴二文僅兼論及楊雲史。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205-212。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

照，刻畫流離心情的詩作。《江山萬里樓詩鈔》編有少年、壯年、中年和強年四集。其中南洋階段的漢詩都編入壯年集，約在詩人 34 歲至 38 歲之間，詩詞接近 200 首，其中詩佔 170 首，數量不少。晚年居港不過三年餘，卻也寫作詩篇三百餘首。可見流離異地，憂患難免，楊雲史以詩抒情記事，自有其個人眼界。

（二）漢詩與地域

楊雲史寫於南洋的漢詩歷來頗受注意。錢仲聯編《近代詩鈔》（1993）選楊雲史詩 35 首，其中寫於南洋詩作佔 9 首。弟子李猷編選的《近代詩介》選楊詩不多，仍不忘收入南洋階段作品。若考察楊雲史寫於出使南洋作品的詩風，既不同於左秉隆詠詩自娛、唱酬或狀寫宦遊落寞，也不同於黃遵憲處理華人移民史的民間採風特點，或經營新派詩的「詩史」場景。楊雲史詩裡的憂患，多採長篇古體、歌行體以紀史姿態表現南洋華人移民事蹟，尤其對中國與西方殖民勢力在南洋地域的消長，有著深入觀察和慨嘆，開啟南洋漢詩辯證地緣政治的視域。另外，楊雲史詩裡的南洋地方感也不同於黃遵憲詩的民俗書寫和風土視野，楊的大量閒適詩反而是生動刻畫南洋山居歲月的意境和心境，追隨唐人格調和趣味，以景取勝，形色俱全。

論及楊雲史的詩風，既非光宣年間盛行的宋詩派，也不屬詩界革命引領風騷的嶺南詩風。他走唐詩路徑，但非江左詩人的晚唐詩派，而是學盛唐高調。歷來詩家大體將其歸類在晚清宗唐詩派。陳衍稱楊雲史詩的風格乃「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啞澀之體」。¹⁴論及詩名，他不及同屬宗唐詩派的前輩樊增祥、易順鼎，當然也屬晚輩。然而，在江東詩人一脈，錢仲聯稱其「近代學唐而堂廡最大者，必推楊雲史」¹⁵，突出了其作為晚清詩壇唐詩派的代表性。當代詩學論著討論楊雲史詩的並不多，少數論者以為楊雲史宗唐主要學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但其弟子李猷就近觀察，楊雲

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4（2008.6），頁 1-24。嚴壽澂：〈晚清詩人與南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409-444。程中山：〈楊雲史香港時期（1938-1941）詩文紀事及其集外佚詩輯錄〉，頁 393-432。

¹⁴ 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收入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582。

¹⁵ 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 673。

史幽深清秀之詩，又得力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詩。¹⁶作為唐詩派的後起之秀，能在新文學與舊詩壇南社當道之際，主唐音而有所改造，這是楊雲史獨特之處。¹⁷而其擅做長篇七言古體詩，乃長慶體風格，敘事和抒情兼備的紀史特色。錢基博觀察其詩也認定「詩史自命，譽滿江左者，則有楊圻焉」。¹⁸然而晚清以降，以詩史格局處理中國千古未有之鉅變的詩人並不少見，透過漢詩理解現代世界和現代時間，同時也是彰顯詩人跟歷史照面的抒情主體。對照楊雲史派駐南洋期間的詩作，感時傷事卻也憂患重重。在領事館工作等於站在西方殖民地前線，在清帝國頹唐之際面對西方勢力和世界趨勢，楊雲史的境外漢詩寫作有一重新探究或界定「南溟」風景的企圖，以詩史態勢建構了頗具現代意識的南洋「史觀」，替南洋漢詩開了另一道窗口。

在論者眼中，楊的南洋時期作品頗有可觀之處，在於這部分「南溟」地域主題的詩作展現了對清皇朝前途和命運的反思，且立足「中國與西方列強在利益分割上的矛盾」。¹⁹論者隱約看到這些寫於境外的漢詩所具有的特殊格局，迥異於境內的寫作。若對照詩家以宗唐和詩史面貌歸納其詩作風格，楊雲史的南洋漢詩反而更多展示了「詩界革命」開啟的視域，透過長序紀史記事，在詩篇外部納入一個抒情主體言志敘事的重要背景。〈哀南溟〉、〈南溟哀〉、〈新嘉坡感懷〉、〈爪哇詩〉等可視為這方面的力作。（詳下文）另外，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到他帶有避世隱居心態經營南洋的山居歲月書寫，追隨唐詩的意境和餘韻。我們觀察以下詩作，大抵可以看出詩人營構的唐詩意趣。

萬綠擁欄杆，花影扶人起。月上夜梳頭，滅燭捲簾子。明月滿珠簾，風露綠芭蕉。不見煎茶人，但見茶煙上。（〈山閣雜詩〉，頁43）

泉聲細落北峰幽，松下房櫳枕篔簹。夜半起來倚空碧，滿身明月看梳頭。（〈山

¹⁶ 郭前孔：《中國近代唐宋詩之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頁325-327。李猷：〈先師楊雲史先生之江山萬里樓詩〉，《近代詩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89-90。

¹⁷ 馬衛中：《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01-302。

¹⁸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收入劉夢溪主編：《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261。

¹⁹ 馬衛中、潘虹：〈前言〉，楊圻著，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頁10。

閣夜起》，頁 75)

南荒佳夕看牽牛，玉露疎星覺早秋。夜半燒香捲簾子，篆煙飛出海山樓。(〈秋夕偕霞客夜遊下山〉，頁 65)

以上三首山居小品，幽麗清逸，難掩雅興，又隱約有幾分生活禪趣。這些興象玲瓏，秀美的唐詩風格，寫景重意境，以直接的美感觀照統整景象，突出了寄居山閣的閒趣，動靜間有其風流婉麗的形象美感。這些仿照唐詩美學²⁰的寫作，大致可以視為他在南洋期間眾多刻畫臥居山林和閒適生活的漢詩特色。

綜觀而言，楊的南洋漢詩顯然具備了不同的寫作特色和功能。就整體南洋寫作的狀態而言，這些分別紀史和抒情的詩作，放在一個具有外交官身分的詩人身上，其見聞確實有別於傳統以詩反思家國危機與地緣政治的格局。而個人旅居新加坡期間卻另有一番在家國視域外的地方閒趣。錢基博從其詩裡就獲得如此印象：「所居頗幽勝，水木數里，風月清夜，孤島絕壁，高咏獨嘯，不知人間何世。」²¹楊雲史的南洋漢詩呈現的兩種視野，或許值得我們重新梳理，對照當時的家國局勢和境外漢詩寫作氛圍，以及他在南洋的見聞處境，楊雲史的紀史寫作和仿唐詩趣味的閒情書寫，在詩和地方感層面形成有意思的對應和拉劇關係。

從 1907 年南來出任新加坡領事館書記官一職²²，楊雲史選擇了在清帝國動盪歲

²⁰ 關於唐詩的美感特質，參柯慶明：〈試論漢詩、唐詩、宋詩的美感特質〉，《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193-274。

²¹ 見劉夢溪主編：《錢基博卷》，頁 267。

²² 關於楊雲史到新加坡領事館任職的日期和時間，他自己就常有數種說法。他自述「余宦遊南夷群島，去國五年」（〈癸丑北遊詩五十首〉，頁 141）、「居南洋六年」（〈楊圻謚妻記〉）就有居南洋長短的不同說法。詩題〈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國奏調司書記新加坡留別王嘯龍章一山諸同年〉和詞作〈如夢令〉的小序：「戊申季冬，冒風雪浮家南渡，星洲氣候溫和……」也有南渡季節的不同記載。時節記載有出入可能是記憶有誤，但卻明確提出了戊申（1908 年）的時間，因此被認定為他出使新加坡領事館的年份。然而，核對外務部所存檔案，至少有兩點是推翻楊雲史 1908 年南渡南洋的說法。楊雲史曾說岳父李伯行奉使英國而將自己奏調新加坡領事館任職。事實上，李伯行（原名李經方）出任駐英大臣是在 1907 年 5 月。根據公文檔案記載，光緒 33 年 8 月（1907 年 9 月）駐英李大臣曾發公文給外務部，內容就楊雲史赴新加坡總領事館供職，而原有在度支部的員外郎官銜未聲敘，故發文轉吏部註冊（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頁 406），可見楊雲史當在 1907 年 9 月已準備動身赴新加坡總領事館任職。而 1911 年 9 月新加坡總領事蘇銳釗替楊雲史為回籍辦理父親葬事請假的申文，更註明「查楊鑑鑒於光緒三十三年九

月裡出走。那年剛好也是左秉隆第二次派駐新加坡任總領事（1907-1910），成了楊雲史的上司。相對總領事左秉隆難以施展抱負的困局，楊雲史雖為領事館小吏，卻有置產南洋的計畫。他在當地橡膠業景氣最蓬勃之時，投入橡膠園種植，兩次返國募集資金，組樹膠公司。就這部分的南洋體驗，已不同於其他使節和文人的過客流寓心態。尤其他還發想「終老是鄉，作始遷祖於南溟矣。」（〈楊圻謚妻記〉，頁 219-220）

其時橡膠是馬來亞地區的重要經濟作物，一般都是歐洲人經營橡膠業。但在英殖民者的要求和鼓勵下，後續有華人開始加入橡膠種植，報刊定時刊載四州府「樹乳」產量。隨著國際市場對橡膠的需求量增加，1909 至 1910 年更是膠價大漲時期，橡膠業替華人帶來巨大財富時有所聞，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後來成為當地僑領和富商的陳嘉庚，1906 年投入橡膠種植，事業就此發跡。陳嘉庚是楊雲史在新加坡認識的朋友，當年受到膠價大漲的風潮鼓舞，因此投入籌辦橡膠生意。陳嘉庚的事業因此愈見規模，但楊雲史在辛亥革命後不再歸返新加坡復職，橡膠園因此荒蕪，最後因無法繳交地稅，被政府充公，他的橡膠事業因此在 1915 年破產結束。楊雲史晚年避居香港時，有〈贈陳嘉庚星洲〉一詩，提到自己投資橡膠業失利，主要是「世亂事親，佐理軍事不能出國，中止種植，園遂荒廢」。²³事實上，華人經營橡膠業往往資金不足，楊雲史組橡膠公司就曾返國集資，據聞還曾向張勳募得十萬銀洋的投資。²⁴因此，華人橡膠園根本難以跟歐洲資本所經營的橡膠園匹比，出口和海外銷售都被外國資本壟斷。很多華人橡膠園最後都賣給外國資本案。

而楊雲史經營的是三千畝的大膠園，一般華人膠園的墾殖需要五至七年。楊雲史描述自己「篳路山林，躬親其役，數日必入山督獠奴工作」，一切親力親為，但也

月（1907 年 10 月）到差已屆四年」。（同前揭書，頁 526）對照以上資料，楊雲史在南洋任職期間應該是 1907 年 10 月至 1911 年 9 月。《江山萬里樓詩鈔》涉及南洋寫作的詩篇共分在卷二（丁未迄庚戌，即 1907-1910 年）和卷三（庚戌迄辛亥，即 1910-1911 年），兩卷都屬壯年作品。因此，楊雲史將南洋作品編輯在丁未年起始的卷二，因編輯出版而重新回憶寫作時間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記錯南渡星洲的時間也並非不可能。因此，本文採取史料檔案記載的時間，認為楊雲史南渡當在 1907 年。換言之，楊雲史在詩文所記憶的時間應該有誤。

²³ 楊雲史：〈贈陳嘉庚星洲〉，《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 150。

²⁴ 關於此說法，參見俞小紅：〈晚清才子的風流一生〉。網址：<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12-6/531681.shtml>（2013 年 6 月上網）。

樂在其中，自稱「蠻夷農夫大長」。這種橡膠園的墾殖生活歷時兩年，在他回憶裡，山林中「泥濘沒脛，無道路，往往毀衣失履，跣足而歸」，但回家看到「夫人已溫湯具美食以待，與兩稚子倚樓而望」，就感到滿足。（〈楊圻謚妻記〉，頁 220）

如此看來，這位領事館的書記官不僅閒居山林，且有拓荒墾殖體驗。他的經歷已大不同於更早來到新加坡的左秉隆和黃遵憲等使節。這些領事儘管關心僑民生活，但有其帝國使節的任務和使命。尤其位居要職，不可能有異域營商墾殖的想法。楊雲史的經驗變得更為特殊，而且他似乎也從橡膠園的經營賺了一些錢。歸返中國後，他在故鄉常熟修建了私人園林「花石林」。²⁵此園林後來在抗戰期間被日軍所焚燬。

辛亥革命那年 9 月楊雲史原擬請假三個月，返國替亡父歸葬。²⁶其時武昌革命已開始，10 月宣統遜位，民國成立後，楊雲史感於時局動盪，滿腔悲憤，不願仕進。當時外事部將新加坡總領事蘇銳釗調任為巴達維亞領事，催促楊返回新加坡復職。但他對世變感到絕望灰心，遂電覆辭職，結束了他在新加坡的歲月。²⁷楊雲史出身保守的政治世家，父親楊崇伊曾任廣西道監察御史，曾在戊戌政變時彈劾康梁。因此，楊雲史在忠清意識下對辛亥革命反感，更痛恨民國後袁世凱把持政局而綱紀淪亡，不願出仕，自然可以理解。

回顧楊雲史在新加坡領事館任職期間，不但清帝國風雲變色，就連南荒之地新加坡和馬來亞，都充滿歷史動盪。新加坡華人社會已有革命黨和保皇黨勢力的拉鋸，然而這些紛爭卻規避在楊雲史的漢詩世界之外，一切雲淡風清，僅有山居的閒適怡情。

烏下吏人散，停車水木邊。夕陽閒洗馬，新月亂鳴蟬。燒竈山中竹，煎茶屋

²⁵ 俞小紅：〈晚清才子的風流一生〉。網址：<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12-6/531681.shtml>（2013 年 6 月上網）。

²⁶ 根據當時新加坡領事館總領事蘇銳釗發給外務部的電報，還特別強調楊雲史家中並無兄弟，回鄉辦理父親葬事勢在必行。唯恐待外務部回覆後啟程會耽誤行程，還特別發電文特請恩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頁 527。

²⁷ 關於楊雲史在辛亥年歸國的時間，陳國安撰述的〈楊圻年表〉僅指出「國變後，11 月謝職歸國」。但根據〈楊圻謚妻記〉的自述，他在農曆八月（西曆 9 月）已歸國葬父，期間不曾歸返新加坡，民國成立後就辭職。對照其時領事館的奏折檔案，楊雲史的請假時間就在農曆八月。顯然年表有誤。

後泉。殊方能健飯，調護覺妻賢。(〈散衙歸山眾客必至婦自治酒食日以為常〉，頁 51)

當使節生活的重心沈浸於山林野趣，對照他同一時期另一類以帝國地理意識呈現的華人移民史和地緣政治觀察的詩篇，顯然形成有意義的辯證。

1908 年 11 月 14、15 日，光緒、慈禧相繼逝世，對新加坡華人社會而言乃是大事，清領事館號召島內華人在 19 日休業，到領事館參加國喪的悼念儀式。²⁸然而，其時革命派和保皇派在新加坡的對立已趨激烈，19 日的紀念日發生的打鬥衝突，以及隨後幾年兩派人士前後的激烈對抗，思想對壘，新馬華人社會都不平靜。然而擅於以詩紀史的楊雲史，當時留存的詩作始終不曾涉及反映華僑社會的見聞。身在歷史現場，卻不曾入詩，頗耐人尋味。楊的創作態度是使節身分造成不得已的迴避，還是楊的南溟視域僅是大中國的視域？離散華人的現實生活始終不入其眼界？或身在異地而有不同的詩學策略？

對於決意遠離中原官場，南來謀職避居的楊雲史，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清帝國末代官吏的眼光？他如何從華人遷徙歷史、中國朝貢外交和西方殖民勢力三個範疇，重估詩對疆域的思索回應，融合為自己建構的南溟視域？這是詩人離散在外的憂患和建立詩史的依據？在閒適的山居生活裡，楊雲史為何跳脫出現實的風土，以唐詩意境的營構回應殖民地的自然景觀？這是詩人刻意的寫作經營，抑或詩學趣味的限制？使節、漢詩、離散因而構成環環相扣的主題，帶出兩個值得觀察的脈絡。在離散華人 (chinese diaspora) 語境下，楊雲史的使節身分面對殖民地環境的種種文化、歷史、地理、語言衝擊和轉化，他對跨越疆界的質疑和回應更深刻觸及離散華人群體的族裔文化身分和記憶，及其離散意識。再者，離散概念不同於傳統宦遊，更能清晰呈現與辯證使節的異地經驗及其文學生產，可能指涉的身分政治、流動主體、民族主義、越界等複雜脈絡。這提供了我們討論使節漢詩的新視角。

對以上相關問題的解讀，正好提供我們從楊雲史的漢詩內部探究故鄉／異地，中國／南洋，大清子民／離散華人交織辯證形成的世界觀與地方感，開啟漢詩與自

²⁸ 不著作者：〈本坡華僑赴總領事署哭臨紀事〉，《叻報》，1908 年 11 月 20 日。

然、疆域的思辨。

二、南溟視域和地緣政治

從 1907 至 1911 年，楊雲史任職新加坡領事館約四年餘的時間。這期間因為替亡父奔喪和籌集投資橡膠園的資金，前後兩次往返中國。在往返途中，楊雲史寫作了多首詩關於他路經南洋島國的觀察，描述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以及各國政治歷史的勾勒。²⁹如同眾多南來詩人一樣，他不乏歷史情懷，對南洋景觀也有自己的眼界。比較特別的是，他集外交官與詩人身分所呈現的憂患，卻也左右了他迥異於其他詩人的漢詩視野。

其時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楊雲史南來之際，大清帝國已岌岌可危，革命思潮正風起雲湧。楊雲史南來謀生之地，偏偏是同盟會在海外的的重要據點。1905 年底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此創立分會³⁰，當地華人領袖張永福獻上宅院晚晴園作為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基地。在更早之前的 1900 年，戊戌政變後流亡國外的康有為接受丘菽園的邀請，抵達新加坡後也創立了保皇會的支部。自此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社會已有兩個對立派別，尊康有為的保皇派創立了《南洋總匯報》(1906-1946)，支持孫中山革命理想的華人則發行《中興日報》(1908-1909)。兩派人馬各有公共媒體作為發聲工具，論戰筆戰因此展開。³¹於是新馬地區掀起了前所未見的華人民族主義的政

²⁹ 程中山指出，楊雲史派駐南洋期間，遊歷泰國、越南曾撰述《南洋群島華人王者考略》、《南溟風土記》、《南荒草木狀》等書，但都在逃離北平時燒毀。由於相關著作已不得見，目前討論楊雲史的南洋寫作僅有詩。程中山的說法見楊圻（雲史）著，程中山輯校：〈前言〉，《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頁 4。

³⁰ 不同於學界過去認定同盟會成立於 1906 年，林義順《星洲同盟會錄》(1928) 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份新加坡同盟會活動記錄，卻記載同盟會創設時間為 1905 年。詳杜南發：〈星洲同盟會到底何時成立？〉，收入周兆呈主編：《百年辛亥南洋回眸》（新加坡：八方文化，2011），頁 18-27。

³¹ 關於此兩大陣營的對立和相關論戰，參見陳蒙鶴：《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8），頁 77-98。至於兩大勢力在新馬的消長和影響，詳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治熱情，無論是親清政府的民族主義或革命的民族主義，那是一個華人移民社會對中國政治最投入的年代。

不過，在此期間抵達的楊雲史顯然對離散華人的這股政治熱情無動於衷，或別有用意的保持沈默。儘管傳說他曾勸阻清廷刺客在新加坡行刺孫中山，並託人轉知孫中山出入當心。³²但他留下的漢詩並沒有反映這些客觀存在於新加坡的社會脈動，或他身處其中的反應。一如其他南來詩人普遍表現的客愁，楊雲史也不在例外。對照他南來前的心境：「豈少他鄉感，甘心作遠遊」（〈京口江樓感賦〉，頁 40），見到同在南洋謀生的友人歸國：「成事艱難同作客，驚心搖落獨歸舟。平生祇愛他鄉好，滿眼家山滿眼愁」（〈余君奉其父喪由天南回國返漢上同為鮮民詩以送之〉，頁 48-49），他跟長官領事交往酬酢之間，依然是「肯為療貧疎骨肉，狂教多病惜風流。百蠻春色濃如酒，應憶中原一客愁」（〈東左子興觀察星洲時乞假回蘇〉，頁 48）。徘徊他鄉的憂思和矛盾，南來鄉愁多了地理辯證。面對異地謀生與祖國紛亂的現實，加劇了楊雲史調整更大的視野來梳理自己對「鄉愁」與「疆界」的思辨，不讓個人情懷只成無謂的喟嘆和虛耗。在他大部分刻畫山居生活、閒情逸致的詩篇中，另有少數兼具紀史和抒情的重要詩篇，成為他的南洋歲月裡獨具特色的作品。從〈南溟哀〉及〈哀南溟〉兩首長詩張揚他對南洋的總體觀照和想像，我們看到了使節詩人的眼界和敏銳。

楊雲史所謂的南溟，取用了一個古老的地理辭彙，從〈莊子·逍遙遊〉借來的南海概念。³³在中國古代地理學意義上，最早在漢代典籍中出現的南海，指的現今東南亞一帶的海域，建立在中南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上的諸古國。到了明清時代，以南洋明確指稱東南亞海域的用法較為廣泛流通和普遍採用。回到〈南溟哀〉的脈絡，我們是否可以揣想，楊雲史在調動南溟此古老概念時，除了懷抱莊子「鵬之徙於南冥」的大鵬展翅意圖，也許還帶有一種歷史的慨嘆？從歷史角度而言，中

³² 陸丹林：〈楊雲史阻止兇手行刺總理〉，《革命史譚》（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4-205。

³³ 〈莊子·逍遙遊〉：「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冥通作溟，大概是中國典籍最早對南溟的生動想像。這指向天然、杳渺的南方大海。

國視域下的南溟，同時有著海洋貿易、朝貢外交的立場，南溟凸顯了一個自古至今，中華帝國面對這一片南方水域和炎荒土地的姿態。

1908年楊雲史寫作〈南溟哀〉（頁45-48）13首，可視為他〈哀南溟〉之前對自我處身南洋的哀愁的鋪墊。首先詩人所哀之事，是自己不樂居京曹，而必須寄跡南洋島國的現實，故有詩：「看盡雲臺人，歸來荒江屋。宇宙何其大，七尺何局促？」而四季如夏的南方異地，既有時序的錯置感：「百卉無代謝，星象失躔陸」，亦有相傳拓殖炎荒的體驗：「異俗證舊聞，新居鑿窮谷」。因此對眼前孤寂的喟嘆：「長從繁華前，回心感幽獨」，進而引發對人生際遇和功名未就的哀傷：「人心非石轉，境遇或一奪」、「父母倚閭望，兒子未成名。中夜起搔首，我乃無弟兄。」他的思鄉藏有個人堅守原則的矛盾和痛苦，因此當「憂懷緬疇昔，壯士摧心肝」之際，也只能自我釋懷：「人生務德業，致身乃區區。海內多賢者，可矣守其愚」，以及抒發時不我與的慨嘆：「思家何足道，明月在京華。明月照美人，深坐獨長嗟」。這十三首詩作表面看來不出自我身世的憂思和南來文人常見的客愁。只是他有官職在身，又是立場保守的忠清官員，謀職南溟所哀的客愁，顯然別有寄託。〈南溟哀〉最後收束的詩作：「披楹見北溟，悠然望宮闕。飛鳥沒遙岑，日夕思故林。遊子行萬里，能無哀傷心？」表達了寄跡萬里，遙望清帝國的域外視野，但內在的哀傷，卻不僅僅是懷念故土的惆悵，而是距離外對朝廷愈見崩壞的反思和憂慮。詩中小序提及「高臺可望，則落日蕭蕭，故國方思，則滄海無極」。忠清的楊雲史選擇南渡本是厭煩晚清官場，於是海外領事館成了一個避風港，或一個調整自我的空間。他期許自己彷彿嵇康「不能外不殊俗，內不失正」，也體會到孔融的「憂能傷人」。顯然在客愁之外，楊雲史另有經營憂患的意圖。

如果將〈南溟哀〉看做是楊雲史在域外對中原的憂患哀思，那麼兩年後寫作的〈哀南溟〉（1910）以長詩搭配長序，展示了詩人跨境出海後，整體觀照南洋的使節眼光。〈哀南溟〉的長序恰似一篇展示詩人南洋史觀的散文。我們可以擷取序中兩段文字，探究在清帝國的最後幾年南來和旅居新加坡的楊雲史，如何呈現出迥異於其他使節的歷史和地理目光。

近二十年，朝廷稍稍知國人多生聚茲土，商業特盛，始有保護華僑之命。初不知樓船橫海，宰割鯨鯢，四百年中執南荒牛耳者，大有偉人在，徒以海禁未開，有司目為海盜，不以上聞，謂珠崖為可棄，等夜郎於化外，聽其自興自滅。至今日而臥榻之側，龍盤虎踞，時機之失，可勝追哉？（頁 67）

詩人批判了清帝國百餘年來保守的海禁政策，對海外華人移民不聞問，任其自生自滅，以致如今西方殖民勢力進駐，南洋已非中國可以掌握的區域。言下之意，詩人強調了一個外部的視域，認定清帝國錯失援引海外華人勢力的良機。在這外部南洋視域背後，一個潛在的帝國中心立場清晰可見。在歐洲人來到南洋以前，這個區域的外在主導力量一直是中國。詩人細數明清以來，華人在南洋各地拓荒稱王的事蹟：

嘗考明洪武中，南海梁道明據三佛齊稱王……萬曆初……林道乾據渤尼稱王，後閩人某復王勃尼……清高宗時……羅方伯亦嘉應人，據喃巴哇，稱王百餘年……同安洪某，據峇眼，地近新加坡；葉來族人某，王婆羅洲之沙勝越……（頁 68）

序的修辭雖簡略，但有史家考據的篤定，儼然展示一幅中國人在南洋佔地據王的譜系。但詩人從具體人物到洪某、葉某的無名記載，顯然他對此段史實也不甚有把握。尤其我們細究序裡提及的幾位顯赫人物，梁道明不過是在三佛齊做買賣的最大私商，林道乾曾是協助暹羅王破安南的明代海盜，羅方伯更是在婆羅洲採集金礦，組蘭方公司（kongsi）的領袖。從私商、海盜到華工，這符合華人南來身分的史實，卻非詩人在意的背景。楊雲史以華人稱王的譜系，大有替離散華人拓荒史未受重視而抱屈：

我人之割據稱雄，我海外霸權者，已非一人一日。其人類皆豪傑，不得志於中國，乃亡命入海，卒能驅策異族，南面稱孤，不亦壯哉？……當時中國全盛，四夷震慄，苟有人羈縻之，則若輩子孫，列若蕃封，而今之英屬五萬方里，荷屬七十三萬里，如荼如火之南洋群島，為我中國有可也。乃有司闇於國勢，無遠謀，昧乎因利之勢，坐失乘便之機，使群雄者勝無可歸，敗無可退，或奪於英荷，或侵於土人，以至漸滅，甚至事跡不彰，姓氏不著，誰之過歟？（頁 68）

透過以上陳述，楊雲史顯然更在意的是盤據南洋的西方勢力。但他卻以歷史上被遺忘的華人立足生根事蹟，強調「時我不與」、「大勢已去」的外交立場，甚至臆想這些華人封王佔地若早獲朝廷招安歸附，可歸為中國領土。作為使節，楊雲史呈現在詩序的史觀既保守，又微妙。在一篇長序主導的視野下，〈哀南溟〉一詩彷彿遵循紀史目光，首先細緻鋪陳了南來遷徙、拓荒、移植的生態和歷史：

炎洲往事堪流涕，五百年間失載記。取而代之大有人，大國小國不可紀……
其間稱王十餘傳，或數十年或百年。一二故事但口述，考之文字殊茫然。……
南荒阡陌起人煙，斬棘披荊不計年。大澤雲深驅象陣，春山日暖種桑田。（頁69）

但詩人接著忍不住控訴清政府對南洋地緣政治的認識不清，無所作為，以致西方殖民勢力到來，一切圖想已來不及，南洋局勢經已底定：

中使頻傳載寶歸，疆臣未識懷柔計。樓船白鳥自西來，金劍塵寒鐵鎖開。霸業寂寥何處問，漁樵蹤跡水天哀。行吟山澤來荒野，形勢淒涼絕壁下。居人猶在話桑麻，夷歌數處驚戎馬。……嗟我乘槎來何暮，物換星移時勢去。（頁70）

楊雲史似乎有末代使節的預感，自己站在已是物換星移，難有作為的歷史時刻。詩人最後以抒情腔調，細訴今不如昔的南洋景況：「煙波浩蕩渚宮寂，春草幽幽春潮濕。絕峽雲荒水客愁，滄洲雨暖鮫人泣。虎嘯龍吟接大荒，管弦哀亂怨滄桑」。如果這是詩人對南洋歷史的慨嘆，使節內心顯然有一股焦慮。晚清以降中國的天下與世界觀正歷經巨大轉變，在救亡圖存的危機感下，士大夫的國家意識與啟蒙救國理念有著重要調整和轉型。³⁴此際出使的官方代表，相較從前的使節難免更具有時代焦慮。楊雲史作為外交小吏，面對一片西方殖民地的南洋，清領事館的功能也難以施展，於是換上詩人眼光回望中國跟南洋交流往返的歷史，他的眼界已是夷夏秩序紊亂的華洋雜處世界。南來者的客愁和哀情頓生，在於這已是一片中華帝國錯失的疆

³⁴ 關於近代中國對外觀念的演變，尤其從天下一世界的觀念變化，以及進入民族國家的觀念轉型，顯然都是跨出國境的士大夫首當其衝的世界觀或政治觀的重構。參陳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國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域。於是，詩人只能「鯤鵬南徙黯傷神，一片興亡問水濱」。他內含的中原中心視域，在南洋已失去界定夷夏、疆域的立足點。這樣的對外史觀儘管不符使節常識，但作為詩人的〈哀南溟〉，其凸顯的憂患，恐怕不僅僅是歷史的感慨，更多了對現實政治意在言外的指涉。就此而言，楊雲史已完全不同於左秉隆、黃遵憲的南洋詩篇，反而多了一個處理外交地理的意識，恰恰正是中國進入民族國家轉型的關鍵時刻。

在〈新嘉坡感懷〉一詩裡，詩人同樣以長序史識來表明立場：

南洋各島，自菲律賓以至印度，星羅棋布，實為中國之附庸。至新嘉坡而地勢一束，天生咽喉，為中國之門戶、歐洲之孔道。苟為中國屬者一夫當關，而歐船不得越雷池一步。惜乎徐福不來，陸賈未至，從古不與中原通，巫來由人愚惰衰弱無知識，今且盡隸英荷矣。（頁 72）

序裡直陳新加坡若為中國附庸，其作為中華帝國於南洋戰略位置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此論調似有一股「遺恨」，認定因馬來人的無能才淪為西方殖民地。而中國錯過新加坡，錯過南洋群島，實屬歷史的錯誤。楊雲史的言論，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深化了晚清時刻中國知識份子看待中國與南洋關係的另一層視野。他著眼的不僅是區域政治的外交佈局，還多了一分中華帝國要窮追直上的憤慨。因此，詩句回應了這股熱情：

邦危猶裸逐，國小亦君臣。山是四時綠，花為終歲春。何年功不世，此地古無人。日夕諸星出，猶知望北辰。（〈新嘉坡感懷〉四之四，頁 73）

末聯將序裡「庚戌、辛亥，遣郎中王大貞、趙從蕃相繼撫慰，而檳榔、仰光、拔泰、維亞、巴東、泗水諸地，先後添設領事館矣」的內涵轉化為詩語，替清廷於晚清時刻在南洋各處增設領事館的背景，補上仰望中國勢力的期待。史和詩在此巧妙對應，楊雲史藉詩感懷，卻也是建立中國的南洋史觀。若對照跟他同一時期抵新位居總領事的左秉隆，左詩裡呈現的感覺卻是情勢已變、人事已非的孤寂和忐忑不安：「同來舊館人何在，獨宿空牀夢自驚。入戶淒淒風有怨，窺簾皎皎月多情。」³⁵由此看來，楊雲史的感慨和立場確實相對積極和強烈。

³⁵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頁 168。

詩人寫作〈哀南溟〉和〈新嘉坡感懷〉諸詩已是 1900-1911 年之間，清帝國接近崩壞之時。這些看似保守的大中國立場，彰顯了對南洋疆域的雄心壯志，但同時也以南溟視域的建構，對應詩的抒情和敘事旨趣，自我辯證其紀史的效能。雖然楊雲史初次跨境出海，但他對中國外部世界的地理想像，不會在此時才開始萌發。在歷代史書記載的南海交通史料裡，楊雲史必然已有對南洋的先驗知識。

中國域外地理學知識的大變動，大概要到晚明西方傳教士東來，才真正打開中國的地理視野，始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³⁶。隨著鴉片貿易、鴉片戰爭以來，魏源完成的《海國圖志》(1842)重新繪製了一幅以海洋貿易軸線和中國及其陸、海朝貢網絡為主的新世界圖景，南洋的地理和經濟位置尤其受到凸顯。³⁷而論者指出《海國圖志》描述西方國家透過經濟和軍事力量進入南洋朝貢體系內部，以致重建朝貢體系的內／外、夷／夏／網絡變得迫在眉睫。如果《海國圖志》描述的海洋世界圖景是一種「追溯失落的帝國視野的過程」³⁸，那麼楊雲史〈哀南溟〉等詩作似乎也暗示了詩人深入把握南洋，重新界定民族離散，夷夏範疇的意圖。

他透過異地地理外交的書寫，以長序鋪陳地理概念和史觀，詳述華人遷徙南洋的歷史，以及拓殖開荒的事蹟。同時提及西洋殖民勢力進駐，破壞了原始的中國—南洋諸島國的朝貢外交，藉此凸顯近代中華帝國的危機。我們不妨藉此探究楊雲史建立的南溟視域，不純然僅是描述中國境外的南洋諸國的一幅外部「風景」。恰恰相反的是，某種內部的視域，決定了詩人主體的外部視域。

南溟被陳述和顯形，恰恰是在某種情境和制度下出現。清帝國在 19 世紀末遭遇西學和西方勢力的現代性衝擊，內部形塑的主體與國體的互涉交融，構成新的輿地學視域，詩人辯證中西關係而產生新的夷夏之辨。朝貢體系的解體、西方殖民勢力的進駐，楊雲史的使節目光，不同於比他更早派駐新加坡的左秉隆和黃遵憲。楊雲

³⁶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頁 346。

³⁷ 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4588-4594。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609-736。關於晚清地理學導致的傳統觀念變異，參見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9-342。

³⁸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頁 655。

史詩裡的南溟，可以看做是重新被發現的「風景」，形成獨特的使節漢詩目光。這裡挪用了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對風景作為一種認識的裝置的思考³⁹，強調南溟視域的建立，恰如對「風景」的思辨，非純粹自然地理描寫，而是探究晚清以降，中國從帝國轉換到民族國家的過渡中，中國與朝貢國家之間夷夏關係的重新建構，凸顯中華帝國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機。而跨境移民和離散華人社群的出現，造成南溟視域的複雜，夷夏之辨和帝國疆域的重申，成為我們解讀這些漢詩背後，使節楊雲史對中西關係的某種理解。

三、詩與朝貢外交

楊雲史對於南洋諸國的歷史回顧，或對中國朝貢外交的陳述，不過是藉由對南溟抒發歷史哀愁，來完成對中華帝國的想像。楊雲史寫詩的時刻面對的是一個日漸衰頹的中華帝國，漢詩裡建構的南溟視域，雖有著外交史上的遺恨和喟嘆，但那被發現的美好「朝貢外交」網絡，卻始終是詩人堅持宣揚的景觀，但又難掩歷史憂患。雖則帝王事蹟過眼雲煙，彷彿詩裡說的「聖武今誰記，旌旗過七洲」（〈過交趾詩〉，頁 56）。南溟地區華人拓殖稱霸的往事，就如湮滅的歷史，不復記得。於是楊雲史寫詩兼備紀史，南洋謀生的這幾年對南洋各國的地理、歷史書寫，已是史家使命，南洋各國朝貢歷史的複述正是回應中國與西方對應的外交網絡。

詩人同樣在〈盤谷詩〉裡透過長序記載暹羅在清朝乾隆年間，清廷派兵緬甸時，暹羅遺臣鄭昭助餉有功，於是清廷「封其子鄭華為暹羅國王帝。昭福建澄海人，今國王之祖也」。小序的歷史回顧至少說明暹羅國王與中國的血統淵源和祖籍原鄉關係。盤谷（今之曼谷）作為暹羅都會，遍布閩粵移民後裔，詩人詩句裡「帝子傷亡國，孤臣怨暮春。霑巾向父老，未敢為他人」（頁 58）隱約點出了華人移民的認祖歸宗，堅守的華人血統文化。

³⁹ 〔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15。

〈越南詩〉(頁 58) 依然以長序陳述清代以來，越南與清帝國維繫著的朝貢外交。序文記述的安南歷史，始於乾隆年間，終於嘉慶，描述安南歷代諸王勢力的更迭，法蘭西勢力的進駐，以及與清朝廷發展的外交關係。序裡著眼的「乞哀朝廷」、「入貢稱臣謝罪」、「遣使北京乞冊封」等敘述，意圖回顧早期越南作為中國藩屬國的歷史過程，但難掩帝國霸權的目光。然而，詩人寫作此詩正是 1910 年路過西貢時興起之感悟，但當時的安南早已是法國的殖民地。這裡顯然有一股帝國鄉愁。回顧史實，從清朝跟安南黎朝建立的朝貢關係，恰恰也中斷於於西方殖民勢力的全面佔領。在 19 世紀中期法國聯合西班牙對越南開始侵佔，在簽訂各式條約後漸進淪陷為法國殖民地。在此過程中，中國在協助越南抵抗外敵顯得軟弱，宗藩關係的意義更在於抑制外國勢力對越南的全面佔領和對中國的侵略。這些史實顯得尷尬且難以入詩，故詩序的「鄉愁」僅結束在嘉慶 9 年改封越南王。以致的詩的末聯提及「獨尋形式在，功業令人愁」，詩人生發的感性哀愁，對應詩序主導的視域，顯然就是藉由哀嘆朝貢體系的瓦解，重申南溟已是西方殖民勢力的範圍。

對照 1900 年嶺南詩人丘逢甲遠行異域，所見所感確實不同。詩人筆下紀錄的異地景象，並不純粹著眼綺麗風光，反處處流露漢人視野下的民族主義情懷。越南是早期漢文化的播遷之地，詩人登岸遊歷卻感觸良多。觀其〈西貢雜詩〉⁴⁰記載的異地經驗，有遭遇殖民者的詫異（「誰知富貴誇真臘，竟屬黃鬚碧眼人」），有憂心越人西化、漢文化失傳的民族憾恨（「未肯洋裝換越裝，金環椎髻素衣裳。傳經但讀佉盧字，遺教無人說土王」），有政教體制的刺激（「可憐膜拜西天佛，管領真歸大法王」），當然更少不了透過物質環境的居屋觀察，影射法國殖民者與越人的階級差異（「金碧樓臺眼界開，競將工巧詫西人。竹籬茅舍清江上，幾樹幽花本色春。」）表面上是丘逢甲遊覽異地風光，實質是教化者的民族胸懷鋪陳，並清楚展示其內在心理的撞擊體驗。

儘管都有民族主義目光，但楊雲史透過詩和序處理的越南，告訴我們那不證自明的中國—南洋史觀，其實是在「華人拓殖／朝貢網絡」的風景中被建立起來的。

⁴⁰ 丘逢甲：〈西貢雜詩〉，收入廣東丘逢甲研究會：《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 460-462。

在〈爪哇詩〉裡，楊雲史對相似史觀的展現更為透徹。詩的長序如此記載：

南洋島國數十，人種不一，國各有主曰蘇丹。上古時互相殘殺而愚情，今馬來隅屬英，蘇門答臘、爪哇屬荷蘭。……綜四百年間，閩粵人為各島國王酋長者指不勝屈，以朝命不至，無以為援，皆旋興旋滅，坐失事機，可勝浩歎。
(頁 57-58)

長序共 368 字，詳述南洋各島國的地理位置、人種和發展狀況，以及閩粵人拓荒有成的歷史。但序裡更強調的聲音，乃是控訴沒有中華帝國的外交奧援，最終是華人移民史的湮滅。於是「當時中國威靈，猶堪緬想」自然成了詩人營造的帝國鄉愁。詩裡寫到：

地脈炎荒坼，人煙海島重。星軺牛斗分，火帝祝融峰。越絕今門戶，中原有附庸。當年多割據，誰與問提封？(頁 57)

詩人喟嘆當年南來開荒闢土的移民先驅，各掌一片天，好不熱鬧，似可看做中原世界的外部附庸。換言之，詩句裡經營另類紙上「鄉愁」，不過是回應長序的「浩歎」，序長詩短，楊雲史要傳達的訊息豐富，史佔據了抒情的位置。詩人著力於描述華人與殖民地的糾葛，嘗試追憶華人往昔墾殖拓荒的往事其實回應了晚清以降梁啟超等人建構的史觀，一個中西關係對抗下詩人對民族國家立場的衝動。

我們可以對照 1903 年流亡在外的朝廷補臣康有為來到爪哇，他以豪情壯志寫下如此詩句：

史萬歲誇廿萬里，鄭三寶身再南洋。中華士夫誰到此，我是開宗第一章。(〈遊爪哇雜咏〉)⁴¹

他有走入南洋異域的特殊熱情，還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與使命。他顯然已自覺的意識到自身的流亡是具體的現代經驗，已非傳統的流放與避地可以比擬。康有為強烈的抒情意志，創造前無古人的舞臺。康楊對照，一位補客，一位使節，雖然兩者詩風不同，但楊雲史一以貫之對華人落腳南洋事蹟的光輝式的回顧，以對照眼前

⁴¹ 康有為 1903 年遊歷南洋地區的緬甸、爪哇、安南、暹羅等地的詩篇，收入《萬木草堂詩集》卷七「逍遙遊齋詩集」。參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171。

華人委身西方殖民地的現實，確實已不同於康有為抒情主體的自我慾望投射。楊雲史的南溟視域，是史觀，也可看做替境外漢詩完成帝國往民族國家過渡期間，一個大中國民族主義視窗的形塑。

於是，詩人可以喟嘆「國人蹤跡少，那得不傷情？」（〈錫蘭詩〉，頁 60）以整體的中國外部世界觀察，慨嘆中國人的封閉保守，以及錯失的歷史光輝時刻。〈緬甸詩〉：「日近長安遠，中原萬里春。深山調象陣，夜市雜鮫人。月出清歌起，鄉心淚滿巾。」（頁 60）全詩出現的長安、中原意象，顯示了身處異國，視野投射仍屬中國地理想象。除了象陣、鮫人稍有地方色彩的描述，全詩不過借景抒情，鄉心才是詩人路過緬甸的真正感觸。左右此詩的地理視域，依然是「哀南溟」的潛在風景。

楊雲史雖然只是領事館小吏，但作為詩人的敏感，他漢詩裡的南溟視野建構，卻真實反映出相對保守的政治立場，以及民族史觀。其中投射的政治隱喻，儼然是清帝國危機下的憂患和感傷。這大概是詩人藉由詩的抒情和序的紀史，辯證轉化出個體在熟悉的漢詩世界裡，聊以安頓自我且面對外部世界的唯一話語。

相較比他更早抵達新加坡出任總領事的黃遵憲，代表作〈番客篇〉展示的就是地誌書寫的風格。〈番客篇〉⁴²對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土生華人的婚禮過程和各族賓客匯聚場面，頗有民間採風特色。這不但表現了 19 世紀末海外華人生活的歷史縮影，被譽為華人移民的「詩史」。黃遵憲著手處理離散華人史的手筆，凸顯其使節身分的另類眼界：「近來出洋眾，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腳。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廓。華民三百萬，反為叢驅雀。」這可以看做是使節漢詩對南洋華人的發現，大概也是漢詩跨境第一次深刻的描述離散華人形象。於是，黃遵憲形容的「化外成都會，遷流或百年」（〈新嘉坡雜詩·其七〉），描述的南洋視域可說是華人移民的流動史，以及在西方殖民地上形成的華人移民社會狀況。

兩種視域相對照，黃遵憲南來之時甲午戰爭還未爆發，清帝國還未陷入絕對困境。但楊雲史抵新已近清廷末日，他的憂患所處理的南洋朝貢外交網絡，目光仍屬大中華帝國下的夷夏視域。無論是朝貢外交的回顧，華人移民拓殖稱雄的輝煌史，

⁴² 黃遵憲：〈番客篇〉，黃遵憲著，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608-640。另外，〈新嘉坡雜詩〉亦收入此版本，頁 587-599。

甚至華人移民的血統和原鄉，都可以化作詩人南溟視域裡，潛在的「哀愁」。

我們比較楊雲史跟黃遵憲、丘逢甲等人南來漢詩的寫作，他的南溟視域顯得更為保守。不過卻也不容否認，楊雲史所處的時代危機更為緊迫。在眾多關於中國危機的論述裡，楊雲史漢詩裡對中國朝貢外交和殖民地華人事蹟的緬懷，多少反證了像梁啟超等知識份子在〈論中國之將強〉（1896）〈瓜分危言〉（1899）等文章裡，強調中國面對西方各國的強弱對比下，自身的危機感油然而生。以致楊雲史同一階段寫作的〈苗疆詩〉、〈金川詩〉和〈臺灣詩〉，儘管無關南洋地理，卻鋪陳清廷征服平蕃的歷史功績。而臺灣歷經荷據、清領，當時正值日治，楊雲史則在詩裡定調：「茲土曾幾時，漢趙幟幾易。君悲感盛衰，我視故朝夕。曾見古今趨，異時今已昔。」（頁 62）詩人認為異國政權的佔據是朝夕更迭，換言之，清帝國收復疆域值得期待。楊雲史的南溟視域無關抒情，卻是在紀史的向度內，留下他對南洋華人拓殖有成，西方勢力入侵，以及反思中華帝國錯誤政策和昔日朝貢外交光輝的圖景。從另一角度而言，楊雲史保守的外交立場，卻也在試探或反證了一個新的區域政治，或呈現中國在一個新的世界圖景中，需要重建的南洋史觀和海洋觀。這也許可以說明楊雲史取「南溟」為題，另有替南溟這個「大地域」進行另類的地景圖繪（landscape mapping）的象徵意義，不求新變異的舊詩語和長序，標示和建構出歷史與地緣政治論述下的南洋地方感。那是辛亥前夕南來使節在漢詩裡某種認知和想像帝國和殖民地的位置。

四、閒適、幽興與地方感

若說漢詩裡的地緣政治飽含憂患，楊雲史在新加坡的生活卻顯得愜意。妻子在異地學習英文，教育兩個小孩，遊走在華人僑商的園囿，夜遊海濱，月下觀潮，避居世外。這是他們夫婦在少年時期願意終老之地，也是生命中的快樂時光。他曾如此描述自己居於新加坡東岸海濱的山居生活：「山間宜吏隱，林臥意蒼然。地僻妻常

健，官閑吏晝眠。」(〈海上曲〉，頁 76) 詩人寫景、寫山居歲月的風情，往往筆觸清麗，意境悠遠。在他留下的大量閒適詩裡，楊雲史直接進入到唐詩美典的世界，抒情、靜好、絕美，完全不同於在「南溟」視域內展現的焦慮。他替自己矗立在郊區的房子命名「海山房櫳」，自己定調為「南洲小吏似遊仙」(〈海上曲〉，頁 74)，寄居在「仙人屋」。除了唐詩韻味的閒適詩，他仍有一輯「海山詞」記載了這段山居生活。他以幽居、閒居的「吏隱」姿態，形塑南洋生活的另一面自然景觀。

他如此回顧那段南洋時光：「或坐臥荒林幽草間，就土人野老習蠻語，問風土。休沐多暇，馳騁乎海滌，出入乎幽谷，登高飲酒，舉目萬里……采摭異聞，眷戀光景，閉門有酒食之歡，高枕有雲海之勝山野之性，願終老矣。」⁴³我們從他清微淡遠的詩句裡，可以看到他意圖營構的隱居閒趣。

海山仙吏宅，池閣夜涼生。遠水夕無浪，天河秋更明。野風湖藕氣，清露曉蟬聲。志屈猶能樂，幽居百念清。(〈山池夜起〉，頁 54)

病骨覺秋早，山居暑氣清。耳根蟬後靜，眼色草前明。月碎花堂夕，雨殘雲木清。西鄰惜長夜，夜半捲簾聲。(〈立秋日東陵山居遣興〉，頁 44)

……披衣拭玉盃，煎茶屏侍役。月照茶煙青，茶煙向月白。竟日斯時清，百念斯時寂。佳景厭人多，清宵勝白日。世人都昏睡，未解賞幽密。(〈夏夕山月如水呼婦夜起煎茶廊下郎吟眉山冰肌玉骨清涼無汗之句幽興橫生〉，頁 72)

這類閒情造景，意境取勝的詩篇，還有〈空山〉、〈草亭〉、〈客去〉、〈山閣夜起〉、〈秋夕偕霞客夜遊下山〉、〈攜妻子看飛瀑〉等，捕捉日常家居片段光景，經營生活品味和野居樂趣。在他強調「病骨」、「志屈」的雙重不良狀態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突出的「賞幽」心境，以避隱的閒適姿態，在「大勢已去」的南溟疆域下，自覺以詩經營一套自然生活美學。我們從摘錄的詩句就能看出端倪：「洗硯雲生壑，烹茶雨滿山。炎洲方物好，莫問大瀛環」(〈山庭春晝〉，頁 64)、「秋竹見燈火，夕澗聞諷詠。我耽南溟幽，孤情百無恐」(〈卜居東陵之麓山海幽深水木明瑟顏所居曰海山房櫳伴嘯詠者妻子而已〉，頁 65)、「一夜竹花雨，山中車馬來。微風掀密葉，斜日漏幽苔」(〈喜

⁴³ 楊圻：〈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二卷三自跋〉，楊圻著，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頁 684。

左子興來山舍清話竟夕》, 頁 42)、「客去主不問, 呼僮但掃花。竹房深見鶴, 松柵晚蟠蛇」(《客去》, 頁 52)。他不問大環境的寂寞, 孤清中怡然自得, 恰似建構一己的自然地景, 對王維、孟浩然詩風的模仿。如果要從這些閒適詩來說明楊雲史處身南洋的「感覺結構」, 那麼讓這位領事館小吏想著幽居和避世的背後, 顯然多了一層疆域和自然的辯證。這類觸及自然生活的閒適詩, 至少有 60 餘首。楊著墨「賞幽」的清興, 處處以唐人的境緣之觀, 凸出意境塑造山居風景, 近似一種建構後的自然, 透過詩學程序完成詩人處身自然景觀的序列, 以雅趣、閒情經營斷片、碎片狀的南溟地方感。相對南溟外交的「地域性」憂患, 楊雲史另外經營「小地方」的生存感受, 捕捉生活中的片段光景, 封鎖特定的生活瞬間, 隱然以清麗詩語砌成大量的自然細節, 撞擊和稀釋長篇古體詩／序的南溟焦慮。詩的自然景觀恰恰在歷史／外交疆域的參照下, 自成另類的地方感。但詩人擅以律詩和絕句的詩型書寫自然, 在追求典麗、簡潔, 經營對偶和餘韻的形式裡, 恰恰也侷限了題材的處理, 以致我們總感受不到太多「現實」風土。

論者曾指出楊雲史的閒適詩, 「如唐人集子中的回聲, 感受不到多少地方感, 都被語言調整為近似的熟悉意象」。⁴⁴言下之意, 儘管處身異鄉異景, 楊雲史以唐人意境入詩, 輕易將外部美景和內在心境, 調整為唐詩美典中恰如其分的意境和趣味。所謂南洋地景, 似乎都已被修飾成唐詩的嫻熟詩語。在少數專寫南洋風物的詩篇, 諸如取材柔佛古國殉情男女化蝶傳說的〈巫來江歌〉:「水雲破碎月脫衣, 夜來化作寒蝶飛。青陵臺畔行人稀, 荒宮梁殿花草非。濕螢暗照雷塘夜, 遊魂歸去青山下」(頁 85)、〈柔佛國蘇丹宮謁其王〉:「欲問高皇帝, 長依漢使臣。趙陀墓在否, 前席一傷神」(頁 49), 這些處處可見的中原典事成辭, 大體已稀釋了南洋風土的底蘊。類似的問題, 同樣出現在 1900 年以降多次進出新馬的逋臣康有為的閒適詩裡。他攜妾避居孤島和檳榔嶼的歲月, 不少性情小品的寫作仍沿用詩詞熟語, 並無確切指涉地景, 尤其處處召喚頹敗帝國更是特色。但細究詩的情感肌理, 康有為的流亡創傷仍顯露在這些閒適寫景詩, 成為流亡地理的刻痕。⁴⁵

⁴⁴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 頁 18。

⁴⁵ 參見拙作:〈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政大中文學報》13 (2010.6), 頁 195-224。

相對康有為，楊雲史寫景和記敘鄉居閒情雅趣的漢詩難掩唐詩人的筆調，但自然風景仍呈現了穩定的視點。熱帶型的風土氣候，赤道地帶變化的天氣，尤其午後雷陣雨和驟雨，貫穿為詩的某種自然肌理。這些山居閒適詩，頻繁出現的「雨」和「水」，就成了主要特色。單從詩題來看就有〈曉雨〉、〈久雨〉、〈溪上雨意〉、〈山閣雨霽〉、〈曉起雨微霽〉、〈入雙林寺避雨〉等，詩句裡雨的景觀和意象更顯頻密：「眼淨雨燈前」、「煎茶看雨生」、「看盡千山雨，歸來滿屋雲」（〈庚戌六月復偕妻子載圖書南渡星洲卜居東林之麓樓館數楹蒼然水木抱琴臥山左右秋色成雜詩一束〉）、「急雨連山晚，飛花帶水流」（〈山麓晚歸〉）、「雨天常似曉，水屋最先秋」（〈久雨〉）、「夜雨洗石壁，潺湲入空谷」（〈曉雨〉）、「雷雨到天明，屋後一峰綠」（〈宿巫來人野舍夜雨〉）、「山雨捲幽草，溪風舞落花」（〈溪上雨意〉）、「潮涼飛雨急，紅粉滿山樓」（〈西友約避暑海嶼攜女樂夜遊飲看雨〉）、「雷響綠苔上，月出青松裡」（〈溪上〉）等等多不勝舉，白描、特寫，將即興、片段的雨入景入詩，在熟悉的聲氣韻律裡鋪陳南洋「風土」。雖然這些詩所形塑的清虛氣韻，幽興雅致的風格，都不難在唐人王維、孟浩然詩作裡找到熟悉的對應，狀寫雨、水也不乏前例。但雨、水貫徹為詩的美感底蘊，捕捉其形色，還是有著詩人對南洋地方感的某種美學轉化和經營。尤其楊雲史直接跟雨、水相關的寫作，就有 41 首。短短數年，頻密將雨、水入詩，這不能不說是詩世界裡嵌入的南洋「感覺結構」。

在此之外，「桃花源」意象也成為詩人談南溟風土的某種詩學策略。他仿照王維〈桃源行〉寫作〈西溪行〉，將自己遊歷馬來半島柔佛州深山大澤，巧遇華人農民的經驗，寫成如下情景：

……爭問中原今何世，乍聞戰伐共長嗟。此間歲月前朝歷，不知治亂幾更易。
 自言避世隔人寰，海上田園無消息。相逢世外兩無心，何如從此宿雲林？……
 先人二世為農父，山中子孫今無數。外邊呼作武陵溪，居人不識桃源路。送
 客含情問後期，重來莫自迷津渡。平明日出照山村，開門滿地榕花雨。（頁
 54-55）

楊雲史對華人遷徙南來生發的浪漫想像，顯然是一幅寓言式的自然景觀。詩裡勾勒的避禍移居、扎根落戶、世代繁衍，句句緊扣離散華人世襲的生活狀態。但「迷津

渡」和「榕花雨」以桃花源意境收束，則是回到傳統主導性的美學化風土。當離散華人縮影為山林農父，詩人成了探幽窺奇的武陵人，迷離虛幻的詩學操作，將華人移民社會昇華為審美對象，抽空了〈哀南溟〉裡「數著殘棋猶未了，風生日落更無人」的落寞神傷。換言之，桃源的舊詩學系統試著重新界定南溟疆域下的移民群體，風土在一套詩語言的適應和馴化過程，確立了「居人不識桃源路」，蒼然世外，悠然相忘的自然風景。因此自然作為嵌入南溟疆域的局部，以〈西溪行〉對照〈哀南溟〉，最能看到憂患和閒適的漢詩寫作裡，詩人覆疊滑動的地方感。在大量閒適風格的「自然」書寫中，詩語和自然的對應／離合，鬆綁了詩人對疆域設邊立界的想像，疆域不再是外交和權力空間配置，同時指向了感官情緒、生活模式、文字符碼的語言部署和調動。但不能否認的是，〈西溪行〉桃花源式的景觀或許耽美有餘，但也遮蔽了離散華人在南洋的生活實況。中國閩廣華人跨境移民的大遷徙，各有不同的南來心路歷程，也有拓荒墾殖的艱辛流離。恰恰是這些苦力、農民和文盲出身的勞動階層組成了華人移民社會的底層人口，但使節眼光往往不觸及此，不曾深入刻劃他們的存在現實。這或許是使節漢詩看不到的一面，又或詩學的規避。

儘管楊雲史將自己在新加坡的山居生活描寫成「養命託長饑，園莽待剪闢。山妻縫耕衣，稚子洗高屐」(〈南洲行〉，頁 74)，但他畢竟是外交官，又怎能完全自絕於外在的現實社會？更重要的是，作為在領事館工作的一員，他在職務上首要面對的，自然是英殖民地的政治生態，以及當地土生華人精英和華人移民社會的士紳階層。⁴⁶我們可以想像，身為書記官或他自稱「譯吏」，難免要處理華工在殖民地的種種人事與法律糾紛，以及協助華工的語言溝通與翻譯。這與殖民地政府的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同時擔負譯者的角色有些相近，不乏深入華人基層的機會。其時保皇和革命勢力已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無以迴避的政治潮流，兩方論戰和宣傳日趨激烈。領事館甚至肩負朝廷交派監視革命黨人活動的任務。另外新馬的孔教運動也在 1908 年透過訂定每年 8 月 27 日舉行紀念孔子誕辰的形式，開始第二波的復興運動。經由領事館倡議公告將孔子誕辰日訂為全體華人的公共假日，店舖歇業，

⁴⁶ 楊雲史在漢詩裡透露的交遊生活，大體是跟華人富商的交往。包括〈遊余氏水源園聽泉〉、〈商人簡仁石邀飲山園〉、〈移居藍氏水園〉、〈遊新山江黃福別墅〉等詩，都以寫景見長。

學校停課，甚至家裡進行孔子像的祭祀。⁴⁷孔教運動所鼓動的華人民族主義和文化熱情，成為當地華人社會的主要脈動。這些影響當地華人社會發展的趨勢，顯然都沒有進入楊雲史的漢詩世界。楊雲史閒適詩裡的自然，接近安分穩定的「疆域」敘事，深入傳統詩學擅於經營的生活美感和抒情，將日常經驗的片段昇華和粹煉，其所勾勒的情感線條和生活肌理，在他的南洋山居歲月突出的自然「景觀」(landscape)，迥異於「南溟」詩篇裡積極探勘、深究的中國——南洋歷史「景觀」。這兩種景觀的經營和轉換，似乎說明了楊雲史替自己南來經驗做了某種程度的詩學「轉譯」，這裡滑動、支離、複疊的地方感，既屬詩學策略，亦投射了清末以降，跨境詩人的寫作賴以存續的文學力量。這是詩作為介入異地、離散和現代情境下的寫作，不得不然的調整和應對策略。我們因此可以檢視「疆域」在跨境漢詩裡的辯證意義。

結語：疆界辯證與詩學策略

就目前所見資料，有關楊雲史在的領事館工作事蹟記載甚少。我們只能從其漢詩內容推敲他「置身其外」的某種詩學策略，畢竟他另有處理地緣政治的「南溟」詩篇，展現營構詩史的意圖，不可能對外在環境的大變化無動於衷。因此，就現實的保身之道而言，恐怕礙於領事館外交官的身分，他不便直接對保皇黨或革命黨的鬥爭介入或表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領事館交際圈子都屬華商資本家和華人中產階級，諸如中華商務總會的領導人物都是親清政府，跟領事館更為接近。楊雲史的民族／政治立場，在某個程度上受限於帝國視域和領事館交際，因此對整體華人社會的掌握和理解終究有隔。但從詩學層面來看，藉由閒適詩所調動的唐詩美典，有巨大的詩學召喚力，對於身處異地的詩人而言，恰恰是唐詩的抒情美學，馴化和調

⁴⁷ 關於新加坡華人慶祝孔子誕辰紀念日的活動，詳惺噩生：〈孔子生日考〉，《叻報》，1908年9月23日。領事館發佈訂定孔子誕辰紀念日為公共假日的通知，詳不著作者：〈重道尊師〉，《南洋總匯新報》第3版，1909年9月29日。關於新馬地區孔教復興運動的研究，詳顏清滄：〈1899-1911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245-282。

和了異地山居的陌生感，或反過來說，是漢詩的寫作不自覺的將崇尚盛唐詩風的楊雲史，帶回到熟悉的表述傳統，詩語消隱了不適，將清廷末代官吏置身英殖民地的陌生環境變得從容自在。

如果這是楊雲史以閒適詩回應南洋的西方殖民疆域的一種詩學策略，我們則可以從他的上司左秉隆詩裡感受到的無力感和焦慮作為參照。時值左秉隆回任總領事，但他的倦勤見諸詩句「髮白蕭蕭愁看劍，可憐豪氣半消除」⁴⁸，甚至任期一滿即馬上請辭。這說明了辛亥前後領事館的工作在時局變遷中更顯複雜。左秉隆的憂思，楊雲史應該有所感受。二人交際頗多，山居對飲又見賦詩。但閒情雅興間，其實別有懷抱。「去矣中原事，哀哉天下才。不因燈濁滅，那見夜光杯？」（〈喜左子興來山舍清話竟夕〉，頁 42），「文字風流近，功名老大期。酒闌閒館靜，山雨漲秋池」（〈約左公飲即席賦贈〉，頁 44），中原事務似已無力回天，壯志未酬的抱憾，在詩人唱和間浮映清晰。對於左的離職，他曾寫到：「三年辭宦海，自覺賦詩清」（〈晚晴酬子興〉，頁 91）。賦詩正是透過詩學手段合理化主體的處境，將抒情自我投射到詩的傳統處置和對應模式裡，甚至以詩的自然閒情「對譯」幽微的內在處境。他一再複述和辯證幽居的意義，卻又潛藏深沈憂思：「幽居無意說飛騰，看劍彈琴獨自矜」、「中原日落水雲間，一局殘棋我獨閒」（〈島中閒居即事示內子〉，頁 88）、「幽居息群念，退食喜餘情。……眾裡逢鄉客，含情問帝京」（〈幽居〉，頁 88）。表面狀寫客愁、懷鄉，但〈哀南溟〉末聯卻是「數著殘棋猶未了，風生日落更無人」，顯然有著外交政治與疆域辯證的憾恨，而「我獨閒」不過是聊以自慰的抒情詩語。於是，更多詩句並置懷鄉／去國的矛盾與熱切：「平生祇愛他鄉好，滿眼家山滿眼愁」（〈余君奉其父喪由天南回國返漢上同為鮮民詩已送之〉，頁 49）、「寧為萬里客，不作故鄉人」（〈得友人書卻寄北京〉，頁 83），甚至在自然風景嵌入結構性的傳統鄉愁：「夜花多雨露，秋水自清涼。獨坐星河永，何人思故鄉？」（〈池上〉，頁 96）、「夕陽滿西南，秋色誰知者？」（〈星洲水原秋望〉，頁 99）

這種種貼近自然、生活的寫作，箇中一再經營的閒情和雅趣，及其釋放的唐人

⁴⁸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頁 169。

意韻，可以看作是詩人承接自哀南溟系列以降，克服和對譯已成殖民異域而生的陌異感的一種詩學手段。如此一來，楊雲史詩裡的地方感不在於他如何或表述了多少在地真實風土，而是一個追憶往日朝貢外交網絡而建立南溟版圖的使節詩人，他寫詩附帶長序一再複述的帝國「光輝歲月」，已是失去的疆域。因此楊雲史著力於閒適詩寫作，成為書寫的另類寄託和轉化，在熟悉的詩學系統內安頓眼前世界，或詩學的閒情雅興總能安分處置站在中華帝國之外，西方殖民地當下，一個官方使節進退失據的抒情。而「地方感」，不盡然只是眼前投入的山風海雨，還包括古今互通共感的詩語，共享的語序符碼和召喚詩學美典所經營的詩的整體存在感。這讓楊雲史順利表徵了自我的存在，且進一步將山居／幽居／閒居環境變為一個可以賦予意義和命名的「地方」(place)。⁴⁹從這個角度而言，楊雲史的閒適詩演繹了另一種建構漢詩「地方感」的思辨，也凸顯了南來漢詩在表面的客愁之外，還有「南溟／地方」的多元豐富層次。

⁴⁹ 「地方」(place) 作為觀看、理解和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觀念。「地方」以觀者位居其中，進而定義、命名、投注和附著意義，關係到我們選擇思考「地方」的方式（或強調，或貶抑什麼），具備日常特徵，為生活提供意義。「地方」標示出以「經驗」為機制的主觀的空間感及時間感，其傾向安全、穩定、靜止。「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相關討論詳〔英〕Tim Cress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16-19。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不著作者：〈本坡華僑赴總領事署哭臨紀事〉，《叻報》，1908年11月20日。

不著作者：〈重道尊師〉，《南洋總匯新報》第3版，1909年9月29日。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

丘逢甲：〈西貢雜詩〉，收入廣東丘逢甲研究會：《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460-462。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

黃遵憲著，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惺噩生：〈孔子生日考〉，《叻報》，1908年9月23日。

* 楊圻著，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楊雲史著：《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文獻，2004。

* 楊圻（雲史）著，程中山輯校：《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2。

楊雲史著：《雲史悼亡四種》，民國刊本，出版年不詳。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王孫、熊融編：《郁達夫抗戰詩詞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

馬衛中：《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
- 郭前孔：《中國近代唐宋詩之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
-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陳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國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 * 陳衍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 陳蒙鶴：《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8。
- 錢仲聯：《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收入劉夢溪主編：《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 〔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
- 〔英〕Tim Cress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二）期刊論文

- * 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32（2010.6），頁 359-398。
- * 高嘉謙：〈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政大中文學報》13（2010.6），頁 195-224。
- 陳益源、凌欣欣：〈清同治年間越南使節的黃鶴樓詩文〉，《長江學術》4（2011.4），頁 144-157。
- 程中山：〈楊雲史香港時期（1938-1941）詩文紀事及其集外佚詩輯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6（2006.10），頁 393-432。
- 程中山：〈楊元璋編《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詩鈔）部分勘誤〉，《文學論衡》12（2008.3），頁 46-59。
- *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4

(2008.6)，頁 1-24。

(三) 專書論文

李猷：〈先師楊雲史先生之江山萬里樓詩〉，《近代詩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89-90。

杜南發：〈星洲同盟會到底何時成立？〉，收入周兆呈主編：《百年辛亥南洋回眸》，新加坡：八方文化，2011，頁 18-27。

柯慶明：〈試論漢詩、唐詩、宋詩的美感特質〉，《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193-274。

陳巨來：〈記楊雲史〉，《安持人物瑣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頁 168-171。

陸丹林：〈楊雲史阻止兇手行刺總理〉，《革命史譚》，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4-205。

顏清滄：〈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 245-282。

嚴壽澂：〈晚清詩人與南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409-444。

(四) 網頁資料

俞小紅：〈晚清才子的風流一生〉。網址：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12-6/531681.shtml> (2013 年 6 月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Mong Hock. *Zaoqi Singapore Huawen Baozhang yu Huaren Shehui (1881-1912)*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 Chinese Society of Singapore 1881-1912). Guangzhou: Guangdong Keji, 2008.
- Chen Yan. *Chen Yan Shilun Heji* (Works on Poetry Commentary of Chen Yan).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Ko Chia Cian. "Empire, Culture and Customs: Imperial Chinese Consuls in Singapore and Mahua Literature." *NTU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32 (2010): 359-398.
- Ko Chia Cian. "Empire Consciousness and Kang Youwei's Nanyang Han Poetr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3 (2010): 195-224.
- Li Qingnian. *Malaiya Huaren Jiutishi Yanyinshi 1881-1941* (Development of Malaya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1881-1941). Shanghai: Shanghai Guji, 1998.
- Ng, Kim Chew. "Superfluous Discourse on the Nanyang Local Color in the Writings of the Traveler-Poets: The Case of Kang Youwei." *Oceanic Culture Journal* 4 (2008): 1-24.
- Yang Qi. *Jiangshan Wanli Lou Shicichao* (Collected Poetry of Jiangshan Wanli Mansio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2003.
- Yang Qi (Yang Yunshi). *Jiangshan Wanli Lou Shicichao Xubian* (Continuation of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the Jiangshan Wanli Mansion). Hong Kong: Infolink Publishing, 2012.
- Yang Yunshi (Yang Yunshi). *Jiangshan Wanli Lou Shicichao* (Collected Poetry of Jiangshan Wanli Mansion). Shanghai: Shanghai Shehui Kexue Wenxian, 2004.
- Yen Ching Hwang. *Xing Ma Huaren yu Xinhai Geming*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82.
-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a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Qingdai Zhongguo yu Dongnanya Geguo Guanxi Dang'an Shiliao Huibian* (A Collection of Archiv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Qing Dynasty). Beijing: Guoji Wenhua, 1998.